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九五期 ——
(二〇一一年四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104b)

【一家之言】	也读“真实而沉重的”邱会作回忆录	芦 笛
【往事非烟】	隔离审查的日子	李 檀
【亡灵祭坛】	“文革”一夜	林一安
【峥嵘岁月】	特殊历史中的特殊世代	谢昌逵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一家之言】

也读“真实而沉重的”邱会作回忆录

• 芦 笛 •

最近香港出版了《邱会作回忆录》。……只看文字水平，则吴法宪回忆录要强过邱会作回忆录许多。前者大概经金秋教授抛光整理，叙事条理清晰，交代明白，而后者则相当杂乱重复。

论思想觉悟，邱氏也远不如吴氏。吴当然也免不了为自己隐恶扬善，文过饰非，但这是回忆录的通病，诚难免俗，然而他在回首往事时总的态度还比较超然，不但把以往的荣华富贵当成一场梦，而且认为毛时代的专业就是人整人，一点意思都没有，还多次向被他整过或伤害过的人诚挚道歉。这就很难得了，考虑到吴将军的出身背景，有此觉悟更是凤毛麟角。

相比之下，邱会作则心胸褊狭，睚眦必报，全书的主题一言足以蔽之：反攻倒算。他最仇恨的人就是据说几乎将他打死的造反派，以及据说是利用造反派将他打入大牢的邓小平。支配他的“世界观”至今仍是毛氏“阶级斗争理论”，在他心目中，“阶级敌人”就是造反派，就是命令他前去接受群众批斗的徐向前，就是复辟了资本主义、断送了毛的革命事业的邓小平。邓小平的罪行还不止是复辟资本主义，更在于首创了“以法律手段解决党内路线斗争”，使得党干从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神道降为可为法律制裁的凡人。他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点，“一篇之中，N致

意焉”。而吴法宪虽然也为自己蒙冤受屈鸣不平，但基本还是就事论事，以陈述事实（当然是他认定的事实）驳斥起诉书上的罪名，从未敢说“党比法大”。

基于这一主题，该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为林彪评功摆好。据邱会作说，林副统帅一贯无限热爱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长征中为毛特地挑选了8个身强力壮的担架员，轮班抬着老毛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又对我军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但没有发动政变，就连“小舰队”、“五七一工程”也是子虚乌有，而毛对林的出走心花怒放，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他不得不承认林彪逃往外蒙是事实，却硬要说那是被叶群和林立果“劫持”使然。

有点常识的人都该听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某个当事人的证言，只有在与其他人的证词详加辨析与互校，并通过了事实、逻辑与常理的证伪之后，才能上升为可靠史料。这就是萧功秦教授说的“无影灯效应”——某个当事人的证词就像一盏灯，在照亮某个历史局部的同时，也因其定向投下了阴影。只有比较不同定向的证言，才能去伪存真，这就如同手术室中的无影灯一样，靠不同投向的灯光消除了阴影。若是高选择性地选取投合自己心意的证词，认定那是“真实而沉重的历史的回顾”，是“珍贵史料”，却对与之相悖的证词一律视而不见，甚至无视人生常识与粗浅逻辑知识，那就是我党“实用史学”的绝活了。

现在以“无影灯”的方式，看看邱会作笔下的林副统帅形象真实到何种地步：

1）长征时期对伟大领袖的忠诚。

奉献8名担架员与一匹健壮骡子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事，我相信是真的，正如我相信邱会作本人自承他在延安当供给部长时善于拍马屁，让伟大领袖享受特殊待遇，被众人痛骂“往上爬”，连毛的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都看不下去一般（1）。但这不过是拍马屁，并不说明林副在政治、军事路线上时时处处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如所周知，林副曾在遵义会议后写信给中央，要毛将刚刚到手的前委书记位置让给彭德怀，使得伟大领袖在会理会议上大发雷霆。这事见于多人证词，包括李德、彭德怀、杨尚昆、刘英、黄克诚等人的回忆录，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还记下了她当时亲耳听到的林彪语录：

“会议从五月十二日开起，一共开了两三天。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下来，闻天叫我邀林、彭到瓦房子里来同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那里已经用门板搁好了铺。我想，闻天的意思是可以缓和气氛，便于谈心沟通思想。

我走进草棚子里，他们正谈得热闹。听到林彪说：‘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说：‘我不干。’”（2）

邱会作及其“凡是派”总不至于否认此事，认定多人的证词是向壁虚构吧？就连林副自己都在庐山会议上承担了责任，说那事与彭德怀无关，是他自己写的信，是不是？

杨尚昆还说，林副坚决反对红军东征山西：

“这个时候，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主席）要走就让他走吧，我到陕南去。彭德怀和我虽然也不想离开陕北，但他比较顾全大局，没有听林彪的。那时候，彭德怀是司令员，但除十五军团外，兵力主要在一军团，而林彪是一军团的军团长，如果听了林彪的，不就分家了吗？”（3）

黄克诚、叶子龙等人也在回忆录中说，东征回来后，毛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林彪的本位主义，

叶子龙还说毛发了火，骂道：“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你林彪个人的队伍么！”林彪随后离开部队，调任红军大学校长（4）。想来凡是派也不敢认为此事是向壁虚构吧？

隐瞒这些史实，硬要把林副说成是从头到尾自始至终的“紧跟派”，其实是对林的一种贬低。毛并不是不能反对的永远正确的上帝，在上述两例中，林的反对都很正确。我已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正在充实改写过程中，刻下才写到抗战结束，却已有24万字，预计年内可以出版）中指出，所谓“四渡赤水”是毫无必要地在原地打圈圈，不但造出“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杨尚昆语）的人间奇迹，而且使得军心涣散，万众离心，招致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林彪、彭德怀、杨尚昆等多名大员反对，酿成深重的领导权危机。林彪最后提出停止“走弓背路”，放弃在云南建立根据地的幻想，迅速北上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正确主张挽救了一方面军。而东征山西则是毛一贯的“左倾冒险主义”，非但未达到原定战略目标，反倒把中央军引入山西，威胁陕北的战略后方。当然，林彪提出的去陕南打游击也是扯淡——彭德怀已经在其自述中指出了，南面是“友军”（亦即与共党勾结上了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去陕南打游击不但会与“友军”翻脸，而且会招致在洛阳驻扎的中央军北上，红军灭亡更速。

2）主持军委工作后对军队建设的巨大贡献。

邱会作将林彪的贡献吹到了天上去，甚至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改变了过去中国“有国无防”的情况，肉麻到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抗战不论，莫非抗美援朝时中国也是有国无防？当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过来人都知道，林副对我军建设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一个武装的政治集团变成了单纯的政治集团。军队只学毛著不练武，当时的口号是：“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邱会作以及凡是派总不能连这事实都敢一笔抹煞吧？若不是军队变得根本不能打仗，“中越自卫反击战”何以打得那么窝囊？就连邱会作本人也在回忆录中连篇累牍地痛骂萧华等人的“空头政治”，却忘记告诉读者怎么去区分“突出政治”与“空头政治”，而若没有“突出政治”这个根本方针，“空头政治”又怎么可能出台。

且看徐向前是怎么说的吧：

“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反彭黄斗争’。……在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期间，部队向正规化、现代化转变中的一些决策和措施，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而加以批判。此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取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搁浅，院校教学一律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甚至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都不去研究，实际上回到了‘穿新鞋，走老路’的状态。

第三次是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上台伊始，也曾提出过某些有利我军建设的措施，例如发展尖端技术，精简军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基层等，军委的同志都是同意的。但此人借革命以营私，表里不一，好走极端，越走越令人感到不对头。例如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提出要在平原地带搞什么‘人造山’，简直是异想天开！又如军事工业，他提出‘山、散、洞’的方针，大折腾一番，把许多内地工厂迁往偏远山区，长期开不了工，造成极大损失。又如分工我管空军，实际上他直接控制刘亚楼、吴法宪他们，根本不让我插手，我说话没有人听，管什么嘛！又如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讲学立场、观点、方法，而是死记硬背，搞形式主义。还有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最活’、‘立竿见影’之类的，令人不可理解。那个时候，我对林彪没有看透，只是有些感觉罢了。一九六四年，总参谋长罗瑞卿抓军事训练，搞了次全军性的大比武，目的是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训练水平提高一步。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都去现场参观过，大家很高兴。但是，林彪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出来反对，大做‘突出政治’的文章。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对罗瑞卿同志发起突然袭击，罗织种种‘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后，‘政治可

以冲击一切’满天飞，流毒之深广，危害之严重，是空前的。”〔5〕

两人谁说的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过来人哪怕是老百姓也该心中有数。不说别的，就拿那“人造山”的笑话来说吧，那难道能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绝招？而把无数第一流军工企业搬到所谓“大三线”的山沟沟里去，则完全是照搬抗战经验，不懂现代战争为何物，更不懂起码的经济规律，严重影响了军工生产，也为继任统治者留下了大批无药可医的出血溃疡。

3) 罗瑞卿、贺龙与杨成武等人都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整倒的。

文革中被整的所有要人，当然都须由毛泽东点头才能被打倒，但这并不等于下面的人不会主动发难。就连邱会作也多次在回忆录中承认，萧华、徐向前等人曾想把他整倒，只是毛要保他才救了他而已。尽管如此，他仍被造反派毒打了一顿（几乎致死倒未必，过于夸大其词）。因此，要有效地整倒某人，下面发难与上面点头缺一不可。至于整人的机制则各不相同，有的是下面主动发难，或是受到被整倒的人的株连，毛认为整也无妨，因而批准；有的则是毛或江青想整，授意下面的人发难。要区分是哪种情况很简单，只需看毛是否批准事后平反。毛主动要整的人如彭德怀、刘少奇、彭真、陶铸等人就毫无平反可能，谁想为他们平反就会连自己都贴进去。而若是毛原无主动整人意愿而是“因势利导”地加以批准，则那些人在其政敌垮台后即可获得平反。

以此观之，则不难立即看出罗、贺、杨等人都不是毛想整的人，因为这三个人都在林彪一死后便获得平反。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时，表示他“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6〕1974年7月，毛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7〕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对贺龙予以平反，恢复名誉。〔8〕对所有这些人，毛都声称是误听了林彪的谗言，难道全是撒谎？同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他为何不为彭真、杨尚昆平反？为何不把罪责赖到林彪头上去？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死不认错，谁胆敢非议他干的事，他就要把谁往死里整。“误听谗言，错整好人”毕竟也是错误，他这辈子大概也就只承认了这个错误，当真难得之至。若那几人真是他主动要整，他又岂会走这一步？干脆坚持整死那些人不就完了？有谁敢出来呼冤？

当然，这不是说发难者只有林彪一人，邱会作披露，罗瑞卿还得罪了叶剑英和聂荣臻等人，杨成武、萧华等人更是上窜下跳。这看来是可信的，因为叶剑英曾在大会上幸灾乐祸地说“将军一跳声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而邓小平则鄙夷地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令罗点点怀恨至今。〔9〕杨成武与萧华充当积极打手也为吴法宪的回忆证实，但林彪指使叶群去诬告罗瑞卿也是不容否认的。据吴法宪说，叶群要他在会议上揭发罗瑞卿的所谓“四条”口信。据邱会作回忆录中所附的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这四条如下：

“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以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还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绝不会亏待你的。’”〔10〕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斩钉截铁地说确有此事，其理由是两条：

第一个理由是，“罗瑞卿（在批斗他的会上）说‘我对陶铸、萧华、杨成武、梁必业说的那些话，我都是说了的。类似的话，还同刘亚楼同志说过，这些都是绝大的错误。’中央工作小组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叶帅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萧华的揭发以及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都提到‘伸手’问题，都确认有‘四条’。翟云英也说有。如果说没有，首先是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他们几个人给全党开了大玩笑，有些人后来改了口，那也只是改了口嘛！”（11）

关于“开玩笑”与“改口”，到底有什么可奇怪的？那难道不是我党行事常规？刘少奇不也曾被全党谴责为“叛徒内奸工贼”么？那是不是毛泽东也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了个大玩笑？后来党中央追封刘少奇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何尝不是“改口”？亏得老邱是14岁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却至死不懂我党的“历史唯物主义”，还要大惊小怪，以为他的质问掷地有声，实在可笑得紧。如果这能用来证明“四条”确实存在，那么不但少奇同志确实是叛徒内奸工贼，彭德怀是大军阀兼反党分子，黄克诚是反党分子，习仲勋是利用小说反党的坏人，贺龙是大土匪……，除了高饶反党集团一直维持原案之外，“解放”后所有钦定的党内坏人也都不平反了，邱会作以及凡是派敢说这话么？

至于叶剑英、萧华等人确认有“四条”，并不等于那“四条”是他们揭发出来的，也并不等于他们为那四条的真实性作了证，顶多只能说他们听信或趁机附和或利用了他人的揭发而已，正如邱会作本人当年同意刘少奇就是叛徒内奸工贼一般。这一点可以从邱会作附上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中轻易看出，那上面列举的证人只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杨成武与吴法宪三个人。（12）

然而吴法宪却在回忆录里承认，他根本没有听刘亚楼死前这么说过。那四条是他在上海开会参与整罗时叶群告诉他的。此后在北京继续开会整罗瑞卿，叶群打电话催促他在会上发言揭发，还说那四条是刘在病重时告诉她的，翟云英也在场，要他去找翟云英落实，并将翟的证词记录下来并让她签字，然后把材料立即送给林彪。吴照办了，但翟云英却说她从未听刘亚楼说过此事，只是见到刘与叶群谈话时曾伸出四个指头。吴让秘书记录了谈话并让翟云英签了字，将材料送给了林彪。在北京会议期间，不但杨成武逼吴发言，问他：“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叶群更几次打电话催逼吴，说刘亚楼的事吴讲最合适，甚至以“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相威胁，吓得吴与余立金次日就在会上发言。在他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得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在听到罗跳楼的消息后，吴内心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挽回了。（13）

所以，所谓“四条”，不是吴将军撒谎，就是邱将军撒谎。但若吴法宪撒谎，动机何在？他已经刑满释放，不存在被逼撒谎的情势，何苦要抓屎抹脸，诬蔑自己作伪证？更何况他还说杨成武也参与逼他作伪证，他写回忆录时杨成武不但还在世，而且潜势力还极大，他犯得上去得罪么？若论组织关系，邱会作是总后的，吴法宪是空军司令部的，刘亚楼与罗瑞卿关系如何，是否说过那些话，邱从哪儿知道？总不会比吴胖子更知道吧？连老吴都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邱到底是哪儿来的底气，一口咬定就是有那四条？

邱会作证明那“四条”确实存在的第二个理由，便是披露了刘亚楼在死前写了封信：

“（刘亚楼在）去世前的四月十五日，他给罗写了一封信，对罗表示不满，因为病重，生前没有交出去。在一九六五年上海会议时，刘的这封信作为证明材料发给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刘的这封信比叶群的发言有力量得多，现在传言邓小平对此事说是‘死无对证’，怎么死无对证？刘生前的信还在嘛！”（14）

既然那封信是“四条”存在的铁证，在给罗定罪时起到了比叶群告的状更大的作用，而且，

邱会作在写作回忆录时显然能看到有关中央文件（否则他也不可能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附在书中了。看来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比吴法宪的潜势力大得多。老吴基本是靠回忆，没有引用过什么文字材料），把那封信引出来不就完了？可惜那信到底是什么内容，邱将军却秘而不宣，除了反复重复“信中刘对罗大为不满”（15），便是臆断：“这封信是上海会议的文件之一，此信对与会人员的震动是高于叶群发言的。因为毕竟是罗让刘上了‘竿子’去和林讲，林又把刘训了一顿，碰了一鼻子灰嘛。一九六五年初，罗瑞卿到上海，去医院看刘，刘和罗大吵一架。……这之后刘的身体状况下降很快，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他们还能吵些什么呢？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16）

什么叫“不言而喻”？莫非林副批评刘亚楼，以及刘罗大吵之时，邱将军都在旁边观战来看？就算他有天眼通，知道争吵的详细内容，他“不言”读者也无法“喻”，对伐？起码老芦没这本事。

这里的昏话，连常理都无法通过：就算真有那四条，难道刘会蠢到去乖乖向叶群传达？“退出政治舞台”云云，不但是诅咒上级早死，而且是党干最忌讳的“政治生命结束”。哪怕是毫无权力斗争经验的草民百姓，也不至于去干这种“狗爬楼梯上猫当”的白痴事吧？刘将军就算让碓打昏了头，想来也会跟罗将军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去说，却要让我去传这种难听话？而罗将军就是再利令智昏，也不至于蠢到无端给林副下战书，反倒提高他的革命警惕性吧？要夺权，悄悄地架空攘夺就是了，还要尽量让上级什么把柄都挑不出来，岂有如此打草惊蛇兼羞辱对方、诅咒对方早死的？这算是《孙子兵法》或《三十六计》的哪一招？

事实上，若刘亚楼真留下了一封信，而那封信又起到了颠覆罗瑞卿的决定性作用（或起码是超过叶群揭发的作用），则邱会作附上的那份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中就一定会引用。然而该报告列举的罗的罪状一共是五条：“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17）其中第一条才是最致命的，而第五条才是有关“四条”的罪行，然而其中无片言只字提到刘亚楼的那封信，只是说：“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都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12）若刘亚楼的遗书真是证明那四条确实存在的“钢鞭材料”，报告为何不引用，而要使用二手证词？

因此，邱会作的这些证词，完全是出于护主心切说出来的，可靠性很成问题。事实上，林彪虽是病夫，却野心勃勃，在文革中远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很整了些人。我已经在旧作《王力反思录干货摘记》中说过，懒得再写，拷贝在此：

“林彪和江青联手把邓小平搞了下去

王力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又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名曰‘生活会’。会议原定整刘少奇，并没准备整邓小平，但江青认为刘少奇已被毛的那张大字报打倒，成了死老虎，邓才是主要危险。据王力说，那是因为邓握有兵权，是她掌权的障碍，在这点上林彪与她想法一致。林彪在发言中没有尖锐批判刘少奇，‘但对邓就讲得很重’，指邓与被打倒的彭真、吴晗以及北京市委勾结，说邓的问题很严重，是政治性质的，那意思就是说邓是敌我矛盾。此外林还争风吃醋，指责邓负责编辑毛选四卷时在注释中突出他的二野，没有把各个野战军摆平。‘这个会上林彪把邓骂成那样，邓没法工作了。邓当场对康生说，我现在没法工作了，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王力还说，林彪并不怎么害怕刘少奇，认为能和他争权的不是刘而是邓。江青也作此想，因此坚持将刘邓并列，以邓为重点。叶群动员萧华与杨成武攻邓，江青与张春桥则动员王任重与王力揭发邓小平。萧华和杨成武根据林彪指示，在会上猛攻邓小平，从邓讲到李井泉、西南局，最后扯到贺龙头上，毛便把这会停了。

据王力说，毛开头并不赞成将刘邓并列。原来毛只计划搞三个月的文革，让刘少奇写检讨，在北京市委范围内搞一下就让他过关了。刘九月份就写出了检查，毛还很满意。但江青和林彪不同意让刘过关。此时地方党委对运动阻力很大，毛认为是刘的错误路线影响所致，遂决定10月间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刘在会上作检讨，邓小平也在会上做了检讨，但那是临时写出来的急就章。陈伯达在总结报告中首先提出‘刘邓路线’的说法，说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刘邓司令部，送交毛审批时毛未反对。林彪又大讲‘刘邓路线’，正式提出了这个词（对外宣传则开头说是‘反革命路线’，后又改为‘反对革命路线’，最后改为‘反动路线’），刘邓就这样平列起来了。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陶铸时，林彪突然大骂李井泉，说李这人最坏，谁最坏他就跟谁在一起，那是针对邓小平的，云云。

以上所说，我觉得颇可信。江青确实联合林彪倒邓，甚至在1968年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力主把林彪当接班人写入党章，说是要让某些人死心，那就是指邓小平。毛对邓确有某种偏爱，可能是‘邓毛古谢集团’案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把邓当成了死去的弟弟。他曾对赫鲁晓夫暗示邓才是他的接班人。50年代毛曾说由他本人挂帅，邓小平作副帅，完全置正式皇储刘少奇于不顾，后来又多次出面保住了邓的党籍，这才会招致深谙老毛心事的江青和林彪的嫉恨。那些鼓吹林彪没有野心、在文革中无所作为的人可以歇歇了。”

4）林彪在文革中与江青作斗争，严禁江青插手军队，维护了军队稳定。

这当然部份是真的，但准确说来，应该是“又勾结，又斗争”，最初倒刘邓时，“枪杆子”和“笔杆子”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以江青才会在8届12中全会上提议把林副作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待到后来共同的敌人打倒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斗争”起来了。勿过，这种斗争，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说难听点便是“狗咬狗，一嘴毛”，实在不必再拿出来炫耀。

林当然严禁江青插手军队，但那只说明他的控制欲与权势欲之强，绝不容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而已。例如他同样严禁徐向前插手军队，上引徐向前语录已经说了：“（军委）分工我管空军，实际上他（林）直接控制刘亚楼、吴法宪他们，根本不让我插手，我说话没有人听，管什么嘛！”莫非那也是值得吹嘘的光荣事迹？

林在文革初期维护军队稳定也不假，徐向前也承认了这一点，说“军委八条”是他和林彪一道去找毛签发的，“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嘛！”（18）这原是白痴也想得过来的事——要乱，只能乱敌人，岂能乱自己？

正因为此，林副完全是高选择性地维护军队稳定。1967年2月23日，青海发生“赵永夫事件”，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指挥军队进攻占据《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打死打伤二百余人。据王力说，赵永夫悍然屠杀平民后，报告了林彪，林彪回答说：“打得好！”三月间，林彪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本来要推广赵永夫的典型经验，但后来赵又变成了“反革命逆流”的典型，林彪在会上首次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于是全国都开始“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四月间，林彪又提出与《军委八条》相反的《军委十条》，据王力说，那文件完全由林彪自己口授，秘书记录。林彪要关锋斟酌一下文字，关锋找了王力和戚本禹，林彪的秘书在外面等着。关锋只作了点文字上的修改，内容原封未动，而王力只提出在前面加上肯定“支左”的成绩的话。修改后林彪即送毛批发。这文件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在

一起，使得全国到处冲击军区，闹得一塌糊涂。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林彪批准全国各地举行大会与游行，把矛头对准了军队。林彪批示：“我经再三考虑，我也参加大会”，与江青等人登上天安门，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社论报导从此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放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于是下令在京西宾馆斗争陈再道，钟汉华，要周恩来主持会议，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王宏坤。六七年八月间，林彪主持中央常委会，讨论专案问题。江青提出要调军队主要负责干部和大批团干部建立中央专案机构。林彪说：从南看到北，从北看到南，从东看到西，从西看到东，军区以上的军队干部都没几个好人。

在此期间，毛一度昏了头，不但批准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而且竟然在7月18日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说要武装工人学生。8月4日，毛给江青写信，认为75%以上的部队干部都是支持右派的，提出要武装左派，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但毛随即又恢复了神智，8月12日，他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陈伯达迅即把奉旨写作社论的罪名推卸给王力。不管怎样，制止抓“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等，还是毛泽东本人。

以上是王力同志的证词（19），与邱会作同志的可完全两样。同是证人，王力的地位相对于邱会作那林彪嫡系相对更超脱些，其证词应该更可靠。即使不可靠，真正持中立客观态度的史家，最起码得先证伪了这些证词，才能尽情讴歌邱将军的回忆录是何等“珍贵的史料”，又是如何“真实而沉重”吧？若歌颂者真对毛共有三分了解，则歌颂林彪“还我长城”（据说是毛泽东当时的批语）可以省省了——毛若不准反军乱军，则谁也不敢反；毛若立意反军乱军，则再有十个林彪也不敢“维稳”。

5）没有“两谋”（谋害毛泽东与南逃另立中央），也没有武装政变，就连是否有小舰队的事都很可疑，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不是叛国，林彪是被劫持的。

这问题我已经在《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20）中分析过了，结论是：

A．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黄吴李邱卷入了官方所谓“暗杀毛主席”和“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四人因此受审乃是冤案。

B．但是，林彪仓皇出逃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他一定是出于非常原因，才会采取这种相当危险的非常行动。

C．没有任何人有那神力绑架或“劫持”林副统帅，丁凯文先生提出所谓“安眠药麻醉说”，连生活常识都欠缺。要让林彪丧失神智任人摆布，还能自己行走（哪怕是扶着也罢），不必他人搬运，除非使用传说中的勾魂术。

D．因此，林立衡向中央举报的“林立果要杀害毛主席”是真的，而这就是林彪在半夜三更不得不顾危险夤夜逃走的原因。

要驳倒这结论，起码得把上面最后三条驳倒吧？可惜凡是派只会“打语录战”，引用这将军那将军的语录，全然看不见邱会作一面声称林彪没有调动任何部队，仿佛那是林彪忠于党国的证明，一面又说“调动一个排都要毛主席批准”，承认林彪根本没有能力发动政变；一面声称公审是“造反派消灭革命派”，一面又声称公审是反对毛主席，是审判文化大革命等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种种胡言乱语。

邱会作甚至还毫无根据地否定林立衡的证词，否认小舰队有过暗杀计划，说：

“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军舰，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况且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的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把自己搞死的儿戏。目前还坚持这个说法，这就是不合情理。”（21）

若是光从逻辑上来说，这又有什么不合情理的？之所以只能让林彪的儿子以及几个空军小干部搞暗杀，完全是因为林彪第一无权调动军队，第二不敢与黄吴李邱策划。邱会作自己就说了，他们拥护林彪，是因为林彪拥护毛泽东。若林彪要反毛，他们当然只会弃林投毛。难道林彪连这点都不知道？既然如此，林当然只能背着黄吴李邱，与自己的老婆孩子商量。至于把自己搞死，那也是万般无奈之举，林就算不先下手，也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刘少奇就是殷鉴。当然，我在旧作中也说过了，林立果那伙人不过是空谈家，虽有计划，未必有胆量实施。一开头，林彪可能并不知道公子干的蠢事，但到后期他肯定知道了，否则无法解释他为何要不顾一切夤夜出逃。

至于小舰队是否存在，吴法宪将军已经作了旁证，那时他和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关在一起：

“从感情上讲，我和邱会作是一伙的，但和王洪文、江腾蛟都有一些隔阂，特别是对江腾蛟。他是我的老下级，当年为了保护他，我不知道伤了多少脑筋，但是最后他居然背着我和林立果搞到了一起。不是他们搞这一套，空军也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也不会是这个下场。就这个问题，江腾蛟曾几次向我表示歉意，我想同样陷身囹圄就算了吧。”（22）

这儿人家可是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江腾蛟和林立果搞那一套，吴胖子也就不会落到那个下场。连吴胖子那林立果的上司以及江腾蛟那涉案人，都承认林立果搞的那一套是犯法勾当，邱会作哪来的底气还要抵赖他不知情的事？若是吴法宪撒谎，他在被释放之后又何必自湮清名，承认他对江腾蛟与林立果的秘密活动失察？

6）林彪外逃后毛喜出望外，声称“林彪帮了我的大忙”。林彪和黄吴李邱等人，是毛为了篡党篡军，任意打倒周恩来和其他军队干部必须除去的障碍：“‘九一三’以后，林彪死了，军委办事组倒了，主席就随心所欲了，批林批孔就是证明，批周公就是证明，把第二号走资派拿出来就是证明，十大王洪文、张春桥、李德生都当了常委就是证明。”（23）

这胡言乱语之出格，没有哪个头脑尚称正常的同志能接受吧？林彪出走是毛一生受到的最大打击，以致他几乎大病不起，甚至向周恩来托付了后事。许多政治立场不一样的知情人都如是说，从吴德、张玉凤直到李志绥，莫非这些人都撒谎？动机何在？

我已经在旧作《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中解释过了：毛想除掉林彪不假，但从未想到林彪敢用这种方式反抗。这就是他何以觉得如此丢脸。更严重的是，林彪及其嫡系（不说是死党吧）以如此方式垮台，宣告了他一生作的第二件大事彻底失败。他知道，没有枪杆子支撑，江青等文革新贵在他死后迟早要垮台，这就是为何他大病一场，甚至自暴自弃，一度拒绝接受医疗，直到尼克松要来访才振作起来，同意大夫们为他治疗。

尤可笑者，老邱闹出自相矛盾的笑话来尚不自知：这么说，林彪是毛泽东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搬掉的障碍了，却原来，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邓是为了走资？那怎么老邱还要指责邓小平背叛毛泽东疯狂走资涅？老邱毕竟是文盲大老粗出身，闹这种低级智力笑话是本分，然而凡是派好歹还上过两天学（初小或完小？），总不至于连这种昏话都跟着追捧吧？

综上所述，《邱会作回忆录》的基调乃是邱会作本人出于对他主子林彪的感恩情怀写的翻案之作，无客观中立可言，其讲述的涉及林彪的许多事与他人的证词相矛盾，也无法通过逻辑或常理证伪。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便宣传那是什么“真实而沉重历史的回顾”，是什么“珍贵史料”，至少是轻率的。

这当然不是说邱的回忆录毫无可取之处。在与林彪无关的地方，该书确实于无意之中提供了若干珍贵的史料，而这些史料之所以珍贵，恰因为它们与其他人的证词相一致，共同揭示了当年的苏区是什么人间地狱。我准备在《〈邱会作回忆录〉的“看点”》一文中对此详加介绍。对不起读者的是，该文将投向有偿杂志以换钱买米下锅，不会在网上无私奉献了。

注释：

- (1) 《邱会作回忆录》(上)，102页，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
- (2)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71—7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 (3) 《杨尚昆回忆录》，1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 (4) 《黄克诚自述》，14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叶子龙回忆录》，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 (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电子书txt版，无页码。
- (6) 胡华：《中共党史人物传》，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 (7) 董保存：《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中央文献出版社，网络版：<http://data.book.163.com/book/section/0000fdVG/0000fdVG120.html>
- (8) 《贺龙平反》，《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66495/10003278.html>
- (9)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215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
- (10)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转引自《邱会作回忆录》(上)，425页。
- (11) 《邱会作回忆录》(上)，376页
- (12) 同上，402，425页。
- (13) 《吴法宪回忆录》(下)，562—564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14) 《邱会作回忆录》(上)，394页。
- (15) 同上，401页。
- (16) 同上，402页。
- (17)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转引自《邱会作回忆录》(上)，423—429页
- (1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电子书txt文本，无页码。
- (19) 《王力反思录》，787—788，792，809，827，810，81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 (20) 芦笛：《领袖们留下的谜团》，下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
- (21) 《邱会作回忆录》(下)，953页。
- (22) 《吴法宪回忆录》(下)，949页。
- (23) 《邱会作回忆录》(下)，955页。

□ 原载“芦笛自治区” <http://www.hjclub.info>

~~~~~

【往事非烟】

## 隔离审查的日子

• 李 撞 •

一，山雨已来

1968年夏秋之交，全国文化大革命发生了重大转折。

7月27日，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由六十多个工厂三万多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开进了首都各大高等院校，实行接管，领导运动。次日，老人家又紧急接见了五大学生领袖，对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头脑膨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敲山震虎。红卫兵小将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日子从此划上句号，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新阶段。

北京二机床厂的工宣队进驻北大时，两派武斗正激战犹酣愈演愈烈。不同于清华的强硬的武装抵抗，北大是“和平解放”，一切都很顺利，武斗嘎然而止，工事拆除，刀枪入库，表面上一派歌舞升平。

我们0363井冈山的男生终于得以重返旧居，从占领的37楼搬回了被赶出31楼。漂泊校外落荒而逃的同学也回来了，两派的人坐在一起，学习，发言，交心，讨论，搞起了大联合，准备着斗批改。

工宣队实际是支持一派的，大刀阔斧对井冈山进行整肃。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划，在我们年级抛出了一颗重型炸弹：齐菊生在文革中写的一封信。据说它被某人截获，缝在被子里，保存至工宣队进校而后上交。这封信其实只是纵横中外，借史喻今，表达了某些对文革的独立思考，抒发了一点灰色的悲观情调。可是经过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它竟成了反革命的纲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宣言。

一信激起千重浪。缺口由此打破，清队正式展开，0363的齐菊生，以及与那封信有关陈醒迈，技术物理系的程汉良，刘立民于是被定性反革命小集团，秘密隔离，立案审查，大揭发，大批判。楼道里布满了大字报，火药味十足，大帽子飞舞。文革中一直在校外，两方组织都没参加的某同学作为“最纯洁”的革命派，当上了陈齐反革命小集团专案组长，也是年级运动领导小组组长，雄心勃勃，一展身手。

0363的井冈山，由二班的“北京公社”，一班的“115师”和三班的“慨而慷”组成，前者是北大井冈山的核心，齐菊生陈醒迈赵凯元等头面人物不少。后两个战斗队则名气不太大，差不多就是跟着走。可是，我们的“师长”吕成信，“老慷”的头头，“刺杀聂元梓的凶手”樊能廷并没能逃脱厄运，继陈齐揪出来不久，也被关起来，悄然消失了。

到了12月，成立了一个专为批判齐菊生的跨班级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十余人，我在其中，由工宣队杨师傅挂帅。他说，你们这些人，过去与齐菊生关系密切，但是现在，你们是批判他的骨干。工宣队相信你们，依靠你们，搞出高质量的文章，击中要害。

“骨干”的黄袍在身，我等哪能不诚惶诚恐，俯首是听？我们把齐菊生的信理出了十几个题目，每人自选一个，分头批判。先搞起版报，后准备批判会。

也有一个公然跳出来唱对台戏的人物，就是赵凯元。他吃了豹子胆，反对批判齐菊生，拒

绝参加学习班，不要做骨干。这个赵凯元，一向有反骨，桀骜不驯，在井冈山内部就经常与齐菊生陈醒迈顶着干，被称为“老牌机会主义者”，外号“赵老机”。不过他出身响当当的贫下中农，根红苗正，正牌红五类，以前齐菊生陈醒迈奈何不得他，现在工宣队也不能怎么样他，主要可能还是忙着攻破陈齐这个堡垒，还顾不上收拾这小子。

召开了一次面对面的小型批判会，齐菊生在久违之后，被拉到了我们面前。我们轮番发言，情绪激昂。他却把脸扭向一边，冷眼旁视，表情木然。在某人发言时，他竟向地上唾了一口唾沫——反革命气焰何其嚣张！我的题目是批判齐菊生信里这样一段话：“拿破仑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用鲜血写的，历史是胜利者用笔蘸着失败者的鲜血写的。”经过寻章摘句，揽古观今，拼凑史料，上纲上线，这句话就是否定群众运动，否定文革，否定唯物史观，我的发言有声有色。

工宣队对这次批判会很满意，还表扬了我的发言。他们就是要让齐菊生知道，他过去的好朋友都已经反戈一击，划清界限，他现在身陷重围，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只有死路一条。

虽说是被逼无奈，也还是为虎作伥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灭顶之灾正在等着我呢。

## 二．身陷囹圄

转年1月8日的晚上，我们班突然集合开会，三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主持人是公社的外号刘大麻子，我们班运动小组组长。他背靠着门，铁青着脸，毫无表情，说，现在批判齐菊生有很大的阻力，我们给了一些人机会，希望他们反戈一击，可是他们把机会浪费了。原因不是别的，他们本身都有严重问题，自己的包袱还没卸下。接着，他提高了声调，“我宣布，从现在起，李H，杨惟立，李人杰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

全场肃静，鸦雀无声。有人偷偷看我，有人把眼光移开。我如五雷轰顶，猝不及防，脑子一片空白，全身一片麻木，糊里糊涂地被带到当晚新调整的宿舍，和看管我的张雅文住在一起。

张雅文是我们班公社中最温和的一位。十年以后我们读研究生，又在同一宿舍，一直是好朋友。他的任务是每天早晨带着我站在毛主席像前作一次“早请示”，晚上作一次“晚汇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念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我跟一句。如此这般。我要吃饭了，他陪我去食堂。我要上厕所了，他送我到门口，等着。我要买东西了（主要是香烟），他替我跑腿。

春节期间，给张雅文放几天假，由我们班的女生轮流值班。这些“老部下”，既不看我，也不管我，自顾自己看书。我说要买烟，看我的女生经过请示，陪我走出西南校门，穿过马路，到了一家小店。我第一次吸收校外自由自在的空气，倍觉清新，感慨万端。

在宿舍里，我的面前是一支笔，一张纸，没有书，没有报，没有广播，没有人说话，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连抓我的刘大麻子也从未露面。唯一定期对我“政策攻心”的，是工宣队张师傅，面善温和，说话推心置腹，谆谆善诱，凡是审罪犯的那些话，可能我全听过了。

我没有别的事可做，每天坐着发呆，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回忆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幕往事，每一个细节，我的每一言，每一行。

我也是“115师”的“师长”，我们战斗队的大字报，大都出自我的手。虽然没有引起过

特别的轰动，每个重要时刻，校园里总有我们的文章，批公社揭老聂，满腔热情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大字报不会有问题，如果有小辫子，早就被揪住了，

我起初担心的读过的那几本毛选和建国后文章汇编。那边边沿沿有不少眉批，是我的心得感想。虽然每一句话都是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敬，恭恭敬敬地写的，但是一要是别人鸡蛋里挑骨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呢？千不该万不该，在3。28武斗对方攻楼时，我只顾自己逃命，这几本红宝书竟然忘记带在身边！

经过察言观色，试探摸底，结论是它们并没有给我带来麻烦。也许收敛我们财物的人把它们扔到了一边，也许审查后发现全是高谈阔论，拿出来反会给我脸上贴金，弄巧成拙。

想来想去我并没有原则上的大错，工宣队不会有我的辫子可抓，只不过是“空手套白狼”。一股冤屈之情涌上心头，我就每次对工宣队哭丧着脸，可怜巴巴，掏心掏肺地说，实在想交代清我的问题，可确实不知它们在那里。

工宣队根本不理我这一套，他们要给我点颜色，让我进了新学习班。

### 三．问题升级

这个学习班活动在二楼的的一间宿舍里，我整个白天都到那里报到。床全撤了，有四张桌子。我们有四个人，各自坐在自己的桌前写材料，互不交谈，以免任何串供的口实。

我最初一看学习班另外三个人，就傻眼了。一个是陈珍德，陈醒迈的女朋友，一个是游君玲，齐菊生的女朋友，都是“反革命家属”，陈齐小集团的当然“死党”。第三个人是我们班的，原来在井冈山动态组，专搞其他院校以及中央上层的动态，就这一条就够他喝一壶的。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完全神经错乱，语无伦次，交代了五大罪状，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是最后一条，其他如组织全家反革命集团，准备叛国投敌，阴谋反革命叛乱，试图谋杀中央领导，等等。

天哪，我的问题升级了。

管理这个学习班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班的，一派的，另一个是二班的，公社的。工宣队的主管换成了杨师傅。这位工人同志永远是表情肃穆，气势威严，眯着小眼，正襟危坐，居高临下。他慢条斯理，反复给我讲一个道理：你如果不交代，没关系，我们把你挂起来，将来在你档案里写“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清楚，请继续审查”，这个结论会跟你一辈子，没有单位敢要你，没有人敢接近你。历史不清白没有关系，不清楚问题就严重了，多少人因为历史的问题没有结论毁掉了一生。

你是要趁着有工宣队帮忙把问题搞清楚呢，还是要带着污点在以后被审查一辈子呢？

对一个对自己前途本来有着美好憧憬的大学生，这些话是何等的残酷！我面临着“不清楚”和“不清白”的两难选择。无论哪一个，都让我一生生活在痛苦的阴影中。我可以想象，以后每次运动我都要被揪出来示众，没有运动我也要夹着尾巴做人，永远抬不起头，一辈子唯唯诺诺。

这位大杨师傅现在应该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几十年前的往事早已置之脑后。可是他的那些话让我牢牢记着一辈子。后来我还有过许多人生的挫折和低谷，每次想一想他描绘的那样的下场，我的感觉会好多了，任何难关都不在话下。

政策攻心奏效了，我痛不欲生，精神崩溃，每次见大杨都是噤若寒蝉，如坐针毡。我急于解脱，再不敢说没的交代。

我的确还是有问题的。在武斗后期，我的心底深处产生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迷茫，疑虑和悲观。聂元梓操纵着一派，对井冈山先是突然袭击，攻楼赶人，接着团团围困，严密封锁，除了弹弓射击，就是武装骚扰，甚至断水断电，采取灭绝政策，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们在一个小的空间里，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日薄西山，困兽犹斗，看不到前途，找不着出路。我们满腔热情投入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干了什么？

我不敢深想，许多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我猜想不少人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我们从来不谈这些。太危险了。

对文革的“不健康思想”，我开始检查，反省了。我斟字酌句，反复推敲，既不吝啬上纲上线的大帽子，又要小心翼翼让每一个想法不那末严重。我知道，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白纸黑字，将来全是反对我的证据，所以写了又改，改又了写，一直到既应付了工宣队，又不至于给我定什么性。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每天就琢磨这点事。

空闲的时候，我有时会想，我们被关起来的其他人，会不会交代，交代什么呢？

有一天我站在窗前，向外看去，正好看见31楼门外停着一辆高级的黑色轿车。不一会，一个被关的同学由两个人陪着钻了进去，车就开走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才回来。我满腹狐疑，一头雾水，他怎末会有这样好的待遇，还能坐着小汽车出去兜风？

从看管我的人那里得知，这个同学交待在西单某处谋杀了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工宣队用车带他到现场核实取证。

车子在我们同学的指挥下东拐西转，穿来绕去，什么也没找到，灰溜溜回来了。后来这个同学当然没有好果子吃，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他把工宣队，专案组大大涮了一把。我不知道他们以后怎样解释自己的愚蠢弱智，总之留下的是抹不掉的耻辱。

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和胆量去愚弄工宣队，只盼着有一天他们开恩，放我一马。

#### 四．逼死人了

隔离的日子很单调枯燥，日复一日，星期几我都弄不清楚。有一个晚上，我和张雅文呆在宿舍里，突然听到楼道一片骚乱，嘈杂急促的脚步声不停，接着就是死一般的寂静，整个楼里好像只有了我们两个人。我什么都不问，蒙头大睡。

第二天我被告知，我们班的李人杰那天夜晚逃出学校，自杀身亡了！

我感到血涌上头，浑身发凉。李人杰，他竟然做出来了，以死抗争！他是广州来的，却说着相当纯正的普通话。他在我们班男生里个子最小，却和个子最高的杨惟立最好。人们最容易记住他的，就是前方的一撮白头发，因而得了外号“小白毛”。这撮白毛一直是他的心病，那时好像没有染发剂，我经常看见他对着镜子梳头，努力把白发掩盖在黑发底下，甚至还试图用电烙铁把它烧出颜色。

小白毛应该说在文革中不太出头露面，只是武斗时一直在楼里，我们日夜厮守了几个月。他为什么被关押，大家都不理解，可能只有刘毅昌能给个解释，我们班关谁，整谁，都是他决定的。可是这个对井冈山的人永远横眉怒对的刘大麻子，在毕业分配时拿了我们班最好的方案，就从此销声匿迹，人间蒸发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

出事那天晚上，李人杰以上厕所为名，趁着看他的人不注意，逃出了31楼，逃出了学校。风高月黑，寒风凛冽，他不停的奔跑，义无反顾，一直跑到四十里以外的清河，在一个老乡家门口的大树上，用自己每天佩带的紫红围巾拴了一个套，上吊死了。那一切好像都是事先计划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死前的交代里，说他最恨我们班三个人，吕成信，杨惟立和我，是这三个人把他这个天真幼稚的青年带上了反革命道路。

我的心在哭泣，李人杰，你死得凄惨悲壮，死的不明不白，死不瞑目啊。

在那个被精神折磨生不如死的日子，就是我自己，何尝又没想过李人杰这条路呢，只不过实行起来也不那么容易。

二班的朱重远就比我有决心。有一天，他把写的材料全都撕个粉碎，从窗户跳出去，准备一死了之。那只是个二楼，他不过是摔个屁股墩，站了起来，什么事情没有。拍拍屁股，从楼梯上了楼，推开工宣队的门，低头认罪，罪该万死。

三班的姚建明对电比较懂，把开关拆下来，手摸两极，以此触电而死。人没有死成，两个手指被电火花打在了一起。

但是这一切决不能阻挡工宣队，专案组前进的决心和脚步。他们在二教召开了李人杰批判大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对抗文化大革命”，义愤填膺，鞭尸问罪。我是在被隔离后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戏的一部分也是演给我们这些人的。

斗争无休无止，打击越扩越大，过了一些日子，我参加了另一个批判会，对象是三班的陈子明。

陈子明是井冈山“慨而慷”的成员，我唯一的天津老乡。因为是工人出身，大联合后被结到三班领导小组，成了井冈山仅有专案组成员。工宣队在他们班审讯的重点樊能廷，是个啃不动的硬骨头，总是被他水来土挡，兵来将挡，毫无进展，于是怀疑有内奸，通风报信。据说设了一个圈套，陈子明真的钻进去了，真面目大暴露。

他被拉倒了批斗台，站在中央。陈子明的外名叫“虾米”，因为总爱弯着个腰，那天他的腰更弯了。他本来脸就白，那天更白了。他本来就有点结巴，那天为自己辩解时更说不清了。

多少年之后，我和他一起回忆往事，他说其实根本没有通风报信，只不过是找了一些井冈山的人，告诉他们不要惊慌，沉住气，没有了了不起的事。工宣队是找个借口，把他清理出“领导岗位”，换上清一色的公社的人。

## 五．重见天日

冬去春来，万物更新，到了四月。工宣队突然找我，说，你准备在班里做个检查，隔离审查就结束了。

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又是一个猝不及防。我面对着三十几个同学——大部分是井冈山的，沉痛地自我批判。大概大家对我竟会有如此的反动思想太震惊了，没有人发言，只有一个人原公社的给了我一点评论，说他看过我的中学档案，有一个偷改食堂饭票的记录，所以我的错误有历史根源。这件小事让我终生不忘，我如何也想不通，怎么我的档案会有如此荒唐的记录，这使我对中国的档案体系深感恐惧。现在我的档案进了人才交流中心，我没交过管理费，谁也不能看，成了一堆废纸。

不管怎样，张雅文用不着再跟着我了，我是自由人了。

没有结论，没有定性。

除了陈、齐等少数人，我们被隔离审查的全部被放出。我们没有弹冠相庆，没有纵情狂欢，因为我们身上的累累伤痕还未能痊愈，因为我们有一个伙伴没有挺住，看到这一天。

我内心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作为一个有错误的人。有了污点，不知道别人怎末看我。我独往独来，形单影只，盼着快点毕业，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正在这时，二班的徐秉玖悄悄找到我，告诉我8341部队进驻了北大，重新调查北大的清队，包括0363的问题。他已经找他们谈过了，对他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要着手解决。他鼓动我赶快去约谈，并且嘱咐说以前所交代的问题一定全部推翻，都是逼供信。

接待我的是一个小战士，年令比我还小。谈得非常好，他肯定了我是无辜受害，受到了错误地对待，并且对我不计前嫌，放眼未来的表态非常赞赏。看来上面是有结论在先了。

紧接着，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系大会，清理工宣队在清队中的错误。我作为没有问题，无辜被整的同学的代表，在近千人面前发了言。对整过我的人，没有抱怨，没有指责，我只是强调它作为我一生的一个宝贵经历，将有助我以后的成长。

中央出了文件，指出工宣队在北大清队中犯了方向性错误，并且特别提到了0363。一个年级里七十几个井冈山成员，竟有二十人被隔离审查，还有许多人受到其他形式的冲击。

我们的事终于有了结论。

六月的一天，化学系几百名师生集合在化学楼前，围成一个大圈，观看烧毁黑材料。中间是熊熊大火，一袋袋一包包的材料投入火堆，变成火苗，化为灰烬。那里也有我的一份，大杨师傅威胁着用来让我永世不得翻身的一份。它们“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火光冲天，烟飞灰灭。大家在欢呼，我的心在翻腾。

一场恶梦结束了，一段历史过去了。

我忽然想起批判齐菊生的那段话。历史倒底是谁写的？

历史会记载这一切的，但不会是由胜利者工宣队、专案组来写。它是我们这些当时的失败



者的历史，要由我们用笔蘸着自己的鲜血来写。

~~~~~

【亡灵祭坛】

“文革”一夜

• 林一安 •

那是1966年8月的一个酷热难当的下午（确切的日期已记不清了），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和第二两个劳改队正在该校东侧厕所一带劳改，有的拔草，有的扫地，有的掏大粪，一个个汗流浹背。这时，两个身穿军装、手攥宽皮带的红卫兵，来到我们面前。我偷眼一瞥，这两个学生，大约十五六岁光景，虽一脸稚气，但透着凶狠。其中一个我还认识，是初三四班学阿拉伯语的。他俩冲着我们吼道：“我们今天晚上要用两个人，给我们抬死尸去！”然后指着党总支书记程璧和副校长雷力说，“你，还有你！晚上跟我们去！听见没有？”我们大吃一惊：谁又遭难了？红卫兵见我们摸不着头脑，用鄙夷不屑的神情说：“实话告诉你们吧，地主婆刘桂兰给打死了！晚上让你们收尸去！”刘桂兰？难道就是幼儿园打扫卫生的阿姨刘桂兰？这人我不陌生：她原来是收拾外籍教师办公室的，我是西班牙语教师，因为教学工作，常常在外籍教师办公室进进出出，隔三差五跟她打照面。在我的印象里，她很有礼貌，干活又勤快麻利，模样儿虽不算漂亮，但整整齐齐，白白净净的，给人好感。后来，不知为什么给调到幼儿园去了。她为人很倔，不会拍马屁，对看不惯的人和事，敢直言顶撞，往往得罪人。她恐怕也就是二十五六岁，怎么成了地主婆给整死了？

我们正疑惑间，忽听得红卫兵又大喝一声：“程璧！雷力！你们俩听见没有？晚上抬尸去！工具房集合！”雷力人高马大，身板硬朗，胆子也大，不发怵；再看看程璧，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其实那时也不过四十多岁），给剃了个阴阳头，衣服上尽是被泼洒的墨迹；而且，前几天，一条腿还给打瘸了。要她去抬死尸，岂不是作弄她吗？我实在看不过去，便硬着头皮，对红卫兵说：“你们别让程璧去了，我去！”红卫兵看看我，没说什么，倒痛快地答应了。

干完活，回到宿舍，我才听说，刘桂兰是在大礼堂前面的空地上被活活打死的。她死得很惨，据说被红卫兵左一皮带，右一皮带，打个不停。那时她还没来得及奶孩子，乳房胀得鼓鼓的，又不讨饶，还不住地还嘴；打红了眼的红卫兵可不是好惹的，便照着她胸部猛打，几皮带她就痛得在地上乱滚，开始还抽搐着，不一会儿就咽了气。我还听说，红卫兵原本也不知道刘桂兰是什么“地主婆”，是医务室（就在幼儿园附近）一个与她有点个人恩怨的人给红卫兵吹的风。

在劳改队里，数我最小，别人都四五十，有的快六十了，我刚三十。我仗着年轻，反正也豁出去了，倒要领教领教“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吃罢晚饭，我看时候差不离了，便到总务处西边的工具房集合，只见雷力早在那里等候了。还是他有经验，带了一条旧床单，是用来裹死尸的。雷力在“文革”中表现得真是“积极”，不但体力活从不含糊，就连他十来岁的女儿由别人唆使在他被红卫兵打破的脑袋上撒盐，他也毫无怨言。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这时，那两个红卫兵也风风火火地赶来了，拿出钥匙，打开工具房的小门，勒令我们进去抬死尸。我们不敢怠慢，赶紧低了头，钻了进去。我们定睛一瞧，在朦胧中看到刘桂兰横卧在地，混身血污，光脚穿着一双褐色塑料凉鞋，散发出一阵阵特殊的腥臭，

令人不堪忍受。雷力飞快地撒开床单，从头到脚把尸体一裹，他抱头，我抬脚，按红卫兵的命令，搬到停在甬道上的吉普车里。

到了火葬场，红卫兵挥舞着皮带，勒令我们抬尸下车。一下车，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儿扑鼻而来……见我们抬着尸体来了，工人师傅倒很和气，把我们领进一个大房间，让我们把尸体放到地板上。我们依命行事，以为苦差就此到头了；不料背上重重挨了一皮带，听到红卫兵大喝一声：“起来！走！在房间里走一圈！”我们小心翼翼地走着，耳边是红卫兵的咆哮：“老实点！不老实，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走完一圈，心想这回该完事大吉了吧？偏偏事与愿违，该着我们倒霉。这时，只听得轰隆隆开来四五辆大卡车。卡车停处，跳下二十来个十四五岁的红卫兵。他们和我们那两个一接头，我们就意识到没有我们好果子吃了。果然，那帮红卫兵里，跑过来三四个，也挥舞着皮带，冲着我们大喊：“你们两个牛鬼蛇神，给我们抬尸去！”说着，便驱赶我们俩朝大卡车跑去。到了那儿，只见有不少人在卡车上忙着搬麻袋，我们一看就明白了，里面装的准是死尸！这时，我脑袋里飞快地一转：“四五辆卡车，就算一辆装十个麻袋吧，这一拨，就是四五十条人命啊，天哪！”正发愣间，红卫兵又吼了：“还愣着干吗？还不快搬！找揍哪？！”我和雷力当然不敢违命，便随其他十几个恐怕也是“牛鬼蛇神”的人一起，使劲地搬抬这一个个十分沉重的麻袋，我心里默默地记着数。整整八条人命！那一夜，加上刘桂兰，我们竟抬了九具死尸！

干完活，我们俩站在停尸房门口，听候处理。我们学校那两个红卫兵也回来了，见我们俩乖乖地站着，过来一人给了我们一皮带，说：“表现还不错，滚吧！”说罢，押我们上了吉普车，回校了，对我们的折磨算是暂告一段落了。

那一夜，仅我们所见的那一小拨，就是四五十条人命，一晚上，恐怕不止这一拨吧，那该是多少冤魂呢？而且，有没有人想过，这些毛头小孩子，怎么一夜之间竟个个变成凶神恶煞、毫无人性了呢？

□

《南方周末》2011年3月24日

~~~~~

【峥嵘岁月】

## 特殊历史中的特殊世代

• 谢昌逵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30年的历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极具特色，而在这段特殊历史中的青年一代也有了特殊称谓。用得最多的是“老三届”，指1966年、1967年、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还有在校大学生将先后在1966至1970的五年间毕业，故被称为大学“老五届”学生。又有学者将“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称为“第三代”。作为一个世代，理应包括全体。不可忽视大学生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还有青年工人也都参加过红卫兵造反活动。但是，从红卫兵组织直到上山下乡，人数最多、活动最强、影响最大而且始终有共同经验的则是“老三届”群体。因此他们更加引起社会的关注，他们自己也有特别强烈的自我认同。

### ◇ 革命的接班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新生，是青春的象征。对外完全赶走了帝国主

义，对内则面对地方割据民族复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真正的统一，而且很快医治战争创伤使国民经济面貌一新，中国共产党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世界舞台，全球华人为之振奋。毛泽东与共产党因此也成了正义和光明的化身，受到了广泛的赞扬。而青年对共和国的成立曾作出重要贡献，青年因此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被舆论认为象征着“火红的青春”。

党和政府当然也充满了自信。在一片大好形势面前，加快了政治与经济建设的步伐，很快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环境，人人都被规定在一个单位之内，成为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对青年来说，由于升学、工作分配再加上户籍制度，个人没有选择权力。这种体制是战争模式的继续，而且形势的发展也使人认为面临着新的更伟大的战争。否定党的八大决议，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独创地提出思想战线上的革命，以难以确定的思想标准来认定敌人。除帝国主义外，苏联也作为修正主义成为敌对力量。面临帝、修、反的军事进攻与和平演变，国内外几乎充满了敌人，已经遇上了空前紧张与严峻的形势，实行备战措施，要与国内外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战斗……

对于以武力夺得政权以后暴力和权力的关系，亚里斯多德早就根据对希腊城邦政治的考察作出过分析：许多以武力致胜的城邦仅适合战时的生活，处于和平时代这些人好像一把尘封的锈剑，不懂如何处理战争以外的事，武力作为手段反而成为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改变以暴力维护统治的惯性。青年工作面对经济建设也曾提出向科学进军、学习是学生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的口号，但是共青团就明确规定总任务是要求青年“永远做坚定的革命派”，时刻准备着做革命的接班人。担当政治的角色确是五四以来中国青年的传统，问题是角色的意义有了深层变化：“曾经是站在时代潮流前头、拯救民族危机的先锋、同腐败官吏和反动政府斗争的勇士、民众的启蒙者和教育者的青年，如今成了接受指导的奉献者，等候接班的后继者。”对这样的角色当时的青年是如何认同的呢。

50年代初怀着对党和政府十分景仰的心情中进入大学的青年，他们自我意识比较成熟，又有接连政治运动的直接经历。当整风运动兴起、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北京大学发起了五·一九民主运动、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批评将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绝对化、极终化与宗教化的倾向，要求发扬其固有的批判精神以打破僵化的思想体制，并且对社会主义、个人崇拜等进行了理论探讨；一方面又关注这种倾向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改变因此在青年中形成的知识贫乏、思想空虚、猜疑冷酷、相互仇恨等现象，要求自己成为有头脑的、有个性的人。钱理群教授对当时大学生的这些思想进行了两个比较：一是与当时的民主人士、政治家们的言论作比较：真正体现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一是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言论作了比较，两者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的观点如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法制，这些认识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是这些青年被当成了敌人，北大有千余学生被开除学籍发配到穷山恶水。顾准在论到“李自成、洪秀全和1957年”时写道：“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北大学生中的右派林昭就是这样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这批大学生是第三代中年龄最大的亚群体。他们继承了五四青年的角色，没有成功但也没有屈服，历史宣判了他们无罪，他们的思想今天仍然极有价值。钱理群教授提出要建立起“1957年学”，这给青年研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从建国以后的中学生是标准的老三届，由中学升大学的则是老五届。在他们成长的年代，“整个大的政治环境的变化，给我这个孩子的感觉，就是中学和小学的经历泾渭分明。我对中学生活最深的印象就是‘革命化’。”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整天就是担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解放

全人类，树立对毛泽东的崇拜。偶像崇拜是青少年突出的心理。第一代英雄人物的事迹成为青年随时学习的榜样，一旦革命任务到来自己也将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成为英雄。唐晓峰回忆：“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

革命化教育强调“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当时的电影、小说中都有大量对极端暴力的描述。1963年10月，教育部主办的《人民教育》发起对“母爱教育”的批判，强调阶级的爱、特别是对领袖的爱绝对高于亲情、师生之情，母爱是渺小的，将人性爱的教育扭曲成了仇恨教育。中国民间早就劝诫“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但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却一直受到广泛欢迎，刘再复认为一种“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已经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现在这种无意识竟由教育当局正式传授给第三代。马笑冬在文革中打人时只有15岁，“在那种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政治立场高于一切的大环境下，我的认识不足以让我选择比较温和的做法。”她们甚至有“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的思想。

当时领导人对接班人的解释是指政治上的接班，被选拔当干部，只能从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青年中选拔，加强了“血统论”倾向，加剧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而权力能否获得完全由党和政府掌握，为此学生们一再地改造自己，表现得好了还要再好，争取入团当上班干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为一种潜意识在少年时期就如此激烈竞争，将深层次地影响他们未来的行动。

第二代人在国共两党武力斗争的政治环境中不再强调个性解放，现在，关于权力、暴力与服从等观念又向第三代人从少年时就灌输，这在历史上都少有。埃里克森主张应该给予青少年一段不应过度承担责任与义务的“隔离时期”，鼓励和允许他们在不断探索与尝试中形成自我认同感。但是强化的灌输使中学生普遍感到思想封闭。与1957年的大哥大姐不同，对青年角色的那种设计，这批中学生少年群体是真心地接受、诚心地履行了。

#### ◇ 接受与挑战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百万红卫兵。叶维丽回忆：“毛那天身穿绿军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一战争时期都很少穿军装。它的象征含义太明显了——中国进入了一个类似战争的特殊时期，而毛是‘红司令’。‘文革’的军事色彩值得注意。”红卫兵回忆当时的情况都认为“确实和宗教狂热没有两样”。毛泽东将政治领袖与思想权威集于一身登上了集权政治的巅峰。全国只有一个脑袋、一种声音。第二代人怀着对理想的信念将自己判断是非的能力上缴给了君师，第三代更是崇拜到了狂热的程度。伟大领袖也深知学生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为了动员他们不惜破坏生产免除一切费用鼓动红卫兵大串连走遍全国，短时间内八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红卫兵在“红司令”的带领下演出了一场大浩劫。

文革前历次运动中暴力迫害致死已司空见惯，当时舆论用词也是“反动堡垒”、“负隅顽抗”、“坚决打击”一类战争语言。主流意识形态更为形成这种心理提供了很强的文化理论氛围。建国后，戊戌维新和五四启蒙被认定属于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性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才是革命的三大高潮。“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被日益贬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被无限拔高。”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残暴广为人知，为了革命手段再残酷也无不可，文革中就公开支持。红卫兵就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在“破四旧”中集合成为群体面对“阶级敌人”时，根据惯例发生类似义和团那样极其残酷与愚昧的行为，形成吞噬千万人生命财产的红色恐怖的“武化”革命。这不过是历史的再现，难怪史学家唐德刚称义和团为“慈禧太后的红卫兵”。至于“一月风暴”后充满武斗的夺权实际是大小内战，湖南

省道县打死数千人，重庆留下红卫兵基地。夺权中提不出什么社会理论的主张，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重演，更是历史的再现。

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一书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思维模式概念模糊混乱而僵化”。以此对照文革时的思维：林彪说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有什么论证和根据？“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他在晚年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左派’和‘右派’常常是混淆是非的”，“首先是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红卫兵也是以非理性的狂热信仰去冲锋陷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服从并不是绝对的。青少年毕竟处在思维发展的时期，一旦在造反中的处境发生变化遇到挫折，复杂的经历带来了新的刺激会触动原有的思维模式，产生逆反心理。老红卫兵受到镇压后就反过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甚至质疑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正确性。在造反派中这种情况就更多。杨小凯曾回忆他那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写作经过，他被打成反革命被关出狱后到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了有广泛支持的批判特权阶层的“新思潮”，使他回想到一月风暴时市民对当权者的强烈不满。他家中的保姆也告诉他多数市民对权势者的专横早已怀恨在心。为此他认为中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重建官员民选的政体。类似的思想在北京、上海、武汉、山东等地都有出现。在当时，成人中也有人在反思但保持沉默。只有顾准在作深入的、超前的理论探索，但文字不能公开。而青年学生这种互相串连与理论探讨，用文字公开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成为全国上下迷恋武力、意识形态十分模糊的环境中出现的思想理论探索，不能不是文革中一道独特的、鲜明的、充满朝气的风景线。

当时打破常规允许学生自发结社互相串连，这种“大民主”环境无疑给青年学生的思想解放提供了条件。自由结社自然会导致自由的思想，为青年思想的变化提供了巨大空间。印红标教授在所著《失踪者的足迹》中，对红卫兵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作为上编进行了详尽分析，包括红卫兵各种派别以及遇罗克、王申酉、杨小凯等青年的种种理论探索。印红标写道：“青年的思想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号召下，一反文革前‘一切听从党召唤’、‘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统一于主流思想的状态，出现了不同政治观点的争鸣。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了一个缺口，哪怕十分有限，也很难驾驭，即使以毛泽东及其为首的中央在青年中的崇高权威，也难以完全控制。”结果，不论是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都遭到镇压。在红卫兵运动结束以后，也“已经不可能使红卫兵一代人的思想重新回到文革前的状态。实际上，从1968年红卫兵运动退潮时，淡出红卫兵运动的青年学生就开始了新的思想探索，并且在日后严厉禁锢的条件下，进行了艰难的思想跋涉。”

#### ◇ 历史转型的先声

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红卫兵不再是主角，许多人成了逍遥派，但是并没有整天玩乐，年轻人求知的天赋，思考社会和历史的愿望，也从未停止。北岛与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集中30位老三届人的长篇回忆：这些年轻人三五成群，在长辈的家中、图书馆中、旧书摊中收寻公开和内部发行的书籍，彻夜阅读，互相传送，展开争论，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中在地下形成了强烈的青年反叛文化，而且城乡互动，被朱学勤称为“民间思想村落”赋有了盛名。这些读书活动被发现后遭到镇压，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青年没有屈服，他们启动了有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作为一个群体开始有了“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面对农村和农民的贫困、落后以及社会巨大差距的现实，禁锢的思想被打开，特别是林彪事件使他们心中的精神建筑轰然垮塌，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人生要自己来管了。在思想村落的作品中涌现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神和救世主已经从天上掉到地下，个人要有理性和自我质询的启蒙精神，做自己的主人。“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想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金大陆教授一再肯定知青的“苦难与风流”，认为在中国当代史上，只有这代既有文化又有教训的青年人，向中国的农村也即向中国传统文化伸展的根部，作了一次大迁徙，对中国的国情体验和感悟。各地城乡互动的思想村落都围绕“中国向何处去”展开讨论，在各方面都比红卫兵时期更深入更切合实际，印红标的《失踪者的足迹》中的下编“上山下乡和四五运动期间的青年思潮”对此也有非常详细的述评。其中就有当时广为流传的张木生对中国农村体制的思考，更有名的是李一哲“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大字报站在时代的潮头，思想敏锐深刻，文笔犀利雄辩，轰动广州，惊动中央，影响波及全国，是文化大革命后续阶段青年思潮中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历史文献。”四五运动后，广州、贵州各地的“民间思想村落”最后集中到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笔者曾对其中的《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今天》等四个刊物作调查后写出长篇报告，并附有其中主要人的小传，他们多是经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青年。这份《一批关心国家大事爱思考的年轻人》的报告发表在刚创办的团中央内部刊物《青年研究》（1979年8月30日）上，引起很大反响，甚至受到有些领导层的支持。彭真委员长曾派杨景宇先生与笔者作过五次长谈，详细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对报告中提出的着手制定出版法、结社法的建议感到兴趣。上述这些青年人的思想探索，既为社会转型打下了群众基础，又为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李陀在《七十年代》序言中指出这代人中的成了学者、文化人，或者成了作家、艺术家。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依附权力的品质。因此他们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无论“思想解放”或是“新启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回声，那么，在这段特殊历史中青少年从愚昧走向觉醒的思想变化，极其难能可贵，是最早起来反对文革的力量，因此是历史转型的先声。

在评论第三代人的时候，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评价他们的理想主义。由于红卫兵的暴力与夺权中有明显的个人利益驱动，因此对它持否定态度。但是，连反思红卫兵时应抓住权力迷醉与兽欲失控的陈思和都认为：“红卫兵运动中也并非完全没有青春激情的因素，可是处在一个充斥着阴谋、夺权、专制和野蛮的时期，这些可爱的青年人身上积极向上的因素被权力者引向了反面。所以，从抽象的意义上反思红卫兵运动，对于其某种精神现象的价值探讨，恐怕还将是学术界的重大科研项目。”大量回忆也证明红卫兵带有理想主义。唐晓峰回忆北京四中同学张育海，文革中写“论出身”助阵遇罗克，接着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全缅共东北军，在给同学的信中引用马克思的话“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不久他牺牲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中。问题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林毓生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一文中提出，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命运与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分不开，但后果与目的适得其反。他引用韦伯的理论：不能仅有实现政治目标的意图伦理，还应对其目标可预见的后果进行深思熟虑并对之负责的责任伦理，因此目的与手段之间处于“紧张”状态，在决策之前就要详尽考虑使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如果以为只要心志纯真就不必考虑后果，甚至以为目标愈伟大，愈可不择手段，这是乌托邦主义的异化。

这里说的“紧张”状态，就是在实现目标的社会实践中遇到新问题新矛盾时，必须对原有手段进行分析与调整，如果矛盾很大甚至失败则应修正原有的政治目标，改变自己的认识。这种思想上的紧张就是对认识的再认识，是具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成熟。所以那时的理想带有盲目的成分，只是一种精神状况，一种宗教信仰，把一切都交给了崇拜的对象成为被运用的工具。而被崇拜的领袖则不同，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所谓“理想”实行后造成巨大悲剧仍不反思，而且为打倒正在反思的同伴大动干戈，天下大乱，无法控制以彻底失败告终。这时的老三届已从少年进入青年，有了紧张的社会实践，因天崩地裂而开始在思想上进入紧张状态。但是当时的精神与信仰仍在，改变的只是要有什么理想、实现的手段何在。他们仍然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但摆脱了对神的依附而要肯定自我的价值和权利。也就是作为一代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实际是在追求个性解放。在当时的历史中，

这是一个使政治脱离宗教的祛魅化过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又一重要表现。“从过去的‘我’中挣扎出来，寻找一个新‘我’；白手起家的奋斗，失而复得地找回整整一代人的位置。他行走着，翻山越岭般的行走，跌滚得浑身是伤，常常走到绝路，又常常看到一线希望。他执著地走，这经历，这过程，是一代人的道路，是一代人的史诗。”这是《苦难与风流》中陆星儿的一段话。金大陆将苦难与风流相联，不愧是研究老三届的专家学者。

“回顾历史，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都经历过自己的成长和成熟，但是如本书里的人物那样，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里倔强生长和成熟起来的人，大概是少之又少。”这是李陀《七十年代》序中的话，这代人真是特殊历史中的特殊世代。对古今中外所少有的这代人，正如金大陆在《苦难与风流》修订版后记中写的“关于‘老三届’人的命运研究，既然已从社会学的框架进入了历史学的视野，它在时间上的追溯将更深远；它在空间上的拓展将更开阔，以及所要面对的史实和问题将更复杂。”在历史视野中，他们既是启动这段特殊历史的先锋，又是推动这段特殊历史转型的先声，前后发生完全了相反的作用，是这代人最大的特殊性。与五四青年由于外来势力引起民族危机而投入政治不同，第三代是在和平环境中响应号召造反形成国内危机因而自我觉醒成为历史转型的先声，有功也有过。人们往往更注意其过，一直存在要求红卫兵忏悔的呼声。其实他们已有不少忏悔，更值得关注的是形成红卫兵的历史环境，要将它作为历史整体的一个环节来考察。神学政治、权力迷醉、暴力仇恨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中负面因素的集中沉淀，集中的暴露反而导致了它的破产。现在是第三代进入成人社会的时候，有的进入权力结构（有的是老红卫兵子承父业），有的成为文人，他们能否将反思文革时的思想与品质保留到成人社会？朱学勤提出“应该反对的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更应该反对的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文革。”我们当然希望将青春的单纯与朝气（如对特权的反对）保留到成人社会，应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至于因苦难反而奋斗走向风流的精神，更应成为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加速中国历史的转型。

（本文原稿15000字，现为压缩稿）

□ 原载：五柳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